

從《大同書》看 中西烏托邦的差異

●馬悅然

康有為的烏托邦之書

康有為年青時寫過一部題為《大同書》的烏托邦之書，書稿的大部分完成於1884年。根據作者的筆記記載，《大同書》完稿於1902年，但直到作者去世後八年的1935年才完整地出版了全書。

康有為在烏托邦的未來世界的描寫中持有許多非常激進的觀點，這些觀點與他的溫和改良綱領和日後人們試圖在中國建立馬克思主義理想國家的嘗試形成強烈的反差對照。

康有為認為私慾是萬惡之源。在《大同書》中，他拆除了自私的人類為了保護自己和自己的財產而設立的種種障礙。大同社會由一個民主選舉而產生的總政府管理，不設任何國界和種界，把地球的表層分切為若干區域，每個區域都設有自治的權力機構區政府。為了不使某一區域的居民對區域產生難以割捨的戀情，建立為他們自己私利服務的當地組織，因此區域居民需不斷改換居住地帶。

按照康有為的說法，種族特徵是由氣候環境決定的，大規模的人口遷居最終會導致完全取消種族差異。為了加速消除種族差異，大同世界的公民實行種族雜婚。

康有為認為婚姻是比其他製造和鞏固社會不平等的機制更為有害的機制，因此他提倡兩性之間的絕對平等。只有廢除做為機制的婚姻和家庭體系才有可能達到一切烏托邦幻想家夢寐以求的目標，即：廢除私有制和私有財產。康有為提出廢除婚姻，主張同居契約，有效期為一年，但可以依照男女雙方的意願而延長契約。

任何人都都有權享受從蒙養園到各級學校的平等教育。學校的最後幾年為年青人的未來職業打下基礎。一切生產方式為國有，教育容易符合社會的需要。



圖 康有為在烏托邦的未來世界的描寫中持有許多非常激進的觀點，這些觀點與他的溫和改良綱領和日後人們試圖在中國建立馬克思主義理想國家的嘗試形成強烈的反差對照。

康有為預見到勞動力的先進機械化最終會縮短工作周的時間。因此，國家必須為公民豐富業餘活動而提供最佳機會。公民們將可以利用業餘時間去旅行。電力車或其他動力車載送公民到世界的任何地方去遊玩，無論是陸地、海洋還是天空。

大同社會不會一夜之間便建成。康有為在書中詳細地描寫了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他特別強調在世界議會成立之前聯合國所起的重要角色。

《大同書》與《共產黨宣言》

康有為不懂任何外國語言。1898年之前他對西方世界的了解十分有限，只是通過閱讀翻譯過來的西方文學才對西方世界有所了解。在他寫《大同書》之前，沒有迹象表明他曾研究過馬克思的著作。把康有為的《大同書》與《共產黨宣言》進行比較，我們可以發現二者有某些共同的宗旨。同時我們應該注意到，節選的《共產黨宣言》於1906年才被譯成中文，而完整的《共產黨宣言》的漢譯文直到1920年才出現。

馬克思和康有為所持的相同主張有：廢除私有制、解除家庭體系、引進國家教育、解放婦女、拆除國與國之間的邊界，以及把所有生產方式集中由國家統一支配。但是兩個思想家的出發點、動機、程序模式完全不同。馬克思的出發點是工業化的歐洲，而康有為則出於自己的儒家背景，從一個普遍性的角度來抨擊現存的問題。馬克思預言無產階級革命會導致所有生產方式的集中，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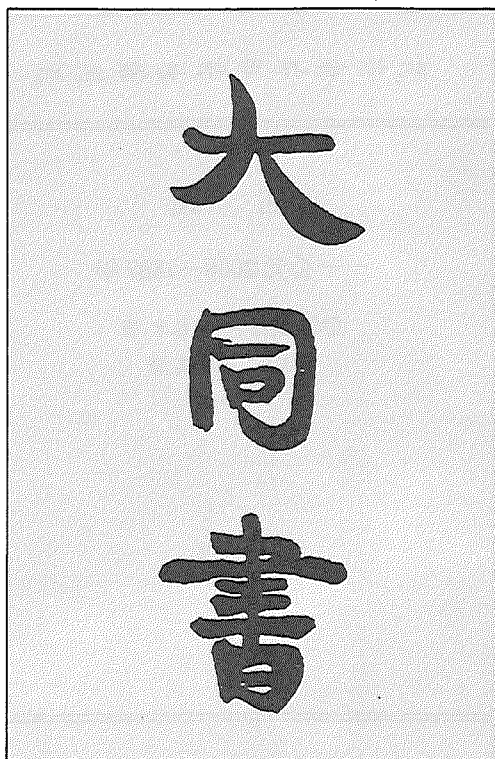


圖 在《大同書》中，康有為拆除了自私的人類為了保護自己和自己的財產而設立的種種障礙。

而可以有效地清除階級矛盾的起因。康有為預言新社會會以和平的方式逐漸發展起來，新社會是國家機構的綜合體，是取代自私的家庭體系和其他障礙之後的自然結果。馬克思避而不談如何建立共產主義社會的道德和倫理標準，堅持認為所有宗教、哲學、倫理和其他意識形態的信仰取決於個人的經濟和階級身分。康有為在儒家信仰上建立自己的烏托邦，認為人的內在仁義促使人熱愛自己的同類。堅信人皆具有社會覺悟是康有為的烏托邦思想的主要特徵。馬克思認為所有人類的苦難直接來源於經濟剝削。而康有為由於年輕時研究過佛家哲學，詳細地分析了造成人類「諸苦」的各種因素。

《大同書》與《百年一覺》

一切烏托邦著作都帶有共同的特性。我們很容易把康有為的《大同書》與愛德華·貝拉米（Edward Bellamy, 1850-1898）於1888年發表的《百年一覺》（*Looking Backward 2000-1887*）進行比較。貝拉米的烏托邦小說講述了一位波士頓的年青人於1887年陷入酣睡，醒來時已是2000年的全然不同的世界。這本書很快成為最佳暢銷書，為在世界上推行社會主義思想起了重要的作用。在波士頓青年沉睡期間發生的社會和經濟的巨變不是通過革命而實現的。當時公眾輿論開始意識到壟斷集團發展得很強大。為了避免壟斷集團為一小撮人的利益服務，國家合併了壟斷集團，使壟斷集團為全體民眾服務。因此，社會經濟的轉變是以和平的方式而取得的。國家具有軍事實力，但國家機器完全只起文職的作用。由於所有的國家都經歷了同樣的發展，因此便不會有戰爭和國際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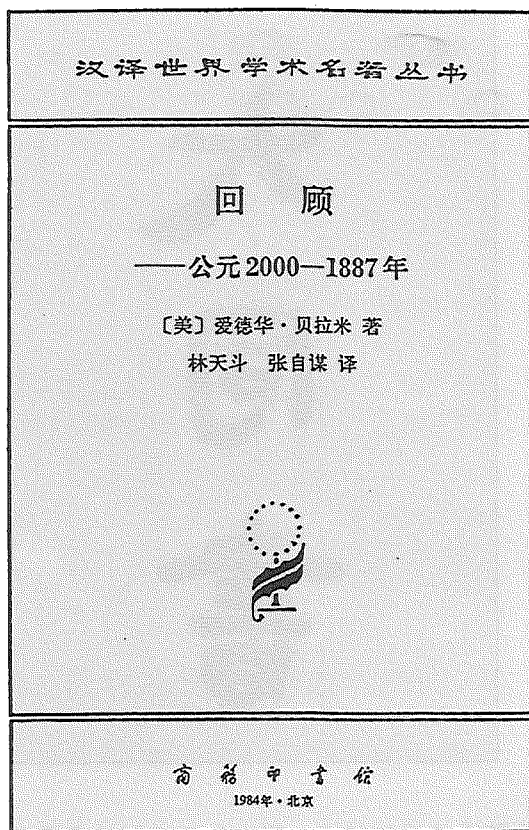


圖 貝拉米的《回顧》為在世界上推行社會主義思想起了重要的作用。

端。貝拉米的烏托邦建築在強烈的愛國主義情感上——新政權的意識形態被稱為民族主義——新世界以自由通商和邊界開放為特徵。

美國學者馬丁·伯納（Martin Bernal）在其著作《1907年之前的中國社會主義》（*Chinese Socialism to 1907*,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6）中認為康有為受到貝拉米的影響。我仔細地閱讀了這兩本書之後，覺得伯納的論點並不令人信服。康有為和貝拉米兩人的著作中的相同特徵——私有制的廢除、國家教育、婦女解放、性別和經濟的平等——可以在多數烏托邦著作中找到。

然而，我們並不排除康有為受到貝拉米影響的可能性。從1891年12月到1892年4月，《百年一覺》的漢譯文，或不如說是意譯，以《回頭看紀略》為標題，在《萬國公報》雜誌上連續登載。這份由兩個傳教士：美國人林樂知（Young J. Allen）和威爾士人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編輯的雜誌於1889年復刊，由教會組織廣學會資助。廣學會除了出版《萬國公報》之外，還出版關於西方文化和技術、基督教文學的圖書和小冊子。林樂知和李提摩太對中國維新運動的領袖很有影響，尤其是1895年之後。他們的雜誌發行量有時甚至達到十萬冊。許多清宮朝廷的達官貴人，包括年輕的光緒皇帝本人，全都閱讀《萬國公報》。

未署名的譯者在意譯貝拉米的第一章關於烏托邦社會時使用了「大同」一詞。馬丁·伯納認為這就是康有為的「大同」之起源。然而康有為在自己的著作中從沒有提到過貝拉米和他的烏托邦小說。眾所周知，康有為的兩個密友譚嗣同（1865-1898）和梁啟超（1873-1929）於1896年曾經讀過貝拉米著作的漢譯本，據此推論，康有為也許有可能讀過這本書。

從大同到小康

儒家經典著作之一的《禮記·禮運》首次使用了「大同」一詞，形容一個古代理想社會。《禮運》之言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歸，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諸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謂大同。」由於古代漢語沒有時態，我們可以——有些人已經這樣做了——把本文中的動詞解釋為「過去時」或者「將來時」。很明顯，上述引語表達了對一個遙遠過去的原始群體主義的堅信，這種信奉是早期道學的特徵。

《禮運》中引用這段話之後有一段描寫最終取代大同社會的社會，這個社會被稱為「小康」，以一定的秩序與和諧為特徵。在小康社會裏，私慾又冒出了醜惡之頭，每個人維護自己和自己家庭的利益，世襲貴族集團用城牆和護城河來保衛自己的財產。綱常名教制約着君臣、父子、長幼、夫妻之間的關係。這種人際關係的嚴格法規導致營私舞弊的陰謀和刀槍劍戟的衝突。正是在社會逐漸衰落的時期，一些被孔子尊為偉大的德行楷模的統治者出現了。

小 結

1949年之後，中國的政治領導人數次對在中國漫長歷史中起重要作用的意識形態因素進行重新評價。文化大革命末期的那次短暫的「批孔」運動便是其中一例。據我所知，自從1949年以來，康有為關於大同社會的論點沒有被討論過。目前，中國國內正準備出版康有為著作的全集。一旦康有為全集得以出版，他的《大同書》毫無疑問將會使許多中國馬克思主義領導人中的正統儒家分子感到震驚。

張京媛 譯

馬悅然 (N.G.D. Malmqvist) 馬教授為瑞典漢學開山始祖高本漢的高足，繼承了高本漢審慎嚴謹的語言學研究，在瑞典一手建立斯德哥爾摩大學中文系。瑞典漢學研究傳統上專注古代經典和語言學，馬教授則通過本人的大量工作把它拓展到對現代、當代中國文學的譯介。馬教授曾兩度出任「歐洲漢學協會」會長，目前為瑞典皇家學院院士中唯一的漢學家。